

中国古代读藏目录叙略

徐建华

读藏目录，中国古代佛典目录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主要作用是帮助、指导佛教信徒们阅读、了解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书。它是一种以大藏经为对象，全面而详尽地介绍大藏经中每一部佛典的经名、卷数、译著者、译本、内容、特点等有关资料并加以评论，向僧俗四众推荐必读经目，指导阅藏门径的目录书。这种目录，其读者对象是固定的，收录范围也是有限的，但却有着明确的编制目的和编辑意图。简明、实用的著录，完备的解题，合理的分类，尤其是解题中带有鲜明的推荐色彩，无论是对于时人阅读大藏还是今人认识、研究中国古代优秀的目录学传统，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读藏目录，是和雕版大藏经同时产生，继而成为北宋以后佛典目录编纂的主流和代表。

汉地佛典，自从梁代释僧祐在定林寺建立经藏集中收藏以来，逐步成为一种风气，大凡寺庙都单辟藏经阁，建立自己的经藏。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其所编的目录《历代三宝记》中单立“入藏录”一类，专门记录当时入藏的佛典，并加以整理、规范。随着佛典翻译数量的增多与系统，隋唐时期数部列有“入藏录”的佛典目录中“入藏录”一类所载佛典

的数量、译本也在不断变化、增加，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长安西崇福寺沙门释智昇所编《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大藏的规模、经目、卷数、译本、分类方才得以基本确立。不久，智昇又将《开元释教录》中“入藏录”略加整理，单独析出，成《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此目除著录经名、卷帙数、译撰者、译本、纸数外，又给每部佛典加注了千字文顺序号，十卷一字，顺序排列。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当时国家所藏大藏经的排架目录，卷末又加载《开元释教录》中“不入藏经目”118部，总计收录佛典1076部、5048卷。至此，大藏经的规模、经目、卷数、版本、分类正式确定，成为后世建立经藏、雕刻大藏的依据。宋代以后，所刻大藏基本都以此目为准，至多增加一些汉地佛教徒的著述。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大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历时十二年，世称“开宝藏”。共雕成经版约十三万块，运至开封印经院印刷，然后颁送各大寺院及邻国。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经，所列经目及顺序完全是依照《开元释教录略出》编定的。

大藏开雕并颁送各大寺院，使一般僧俗四众均有机会直接阅读全部佛典。同时，统一的版本又使一切学佛之人对于教义的理解有了正确的依据，这对于佛教的传播，意义是巨大的。然而，由于佛典卷帙浩繁，仅“开宝藏”就收录佛典1076部、5048卷，而且越到后代数量越多，明初开雕的北藏，已达1615部、6771卷，因而，一个人是很难将所有佛典全部读完的。再说，一个普通的佛教信仰者也无须读完全部佛典。面对着浩繁的佛典，应该怎么读，读什么，哪些佛典应该精读，哪些佛典应该粗读、浏览，哪些佛典可以一般了解？这是摆在每一个佛教徒面前的难题。为了使信徒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佛典的全貌，基本掌握佛教的

教义实质，细读该读的佛典，以最少的时间尽量获得最大的功果，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介绍大藏所有经目、内容，推荐必读经目的工具出现。读藏目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第一部读藏目录，是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也就是益州雕藏的前四年出现的。“右街应制沙门文胜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引》，凡六百六十卷”（《佛祖统纪》卷43）。此书虽名为“索引”，但卷数多达660卷，当不会是现代检索意义上的索引，而只能是钩玄索隐，逐函介绍所收佛典内容大义的读藏目录。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释慈云又撰《教藏随函目录》，此为“述诸部著作大义”（《佛祖统纪》卷45）之书，也当为一部逐函“述诸部著作大义”的读藏目录。可惜的是，由于时代久远，这两部读藏目录均已亡佚，无从考察其具体内容及编排特点，但其读藏目录的身份却是无可怀疑的。

现存下来的读藏目录尚有如下数部：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东京法云禅寺住持惟白所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北宋王古撰、元人管主八增订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明万历间秀水沙门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五卷、《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清顺治年间北天目沙门智旭《阅藏知津》四十八卷。

二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 （宋）惟白撰

惟白，俗姓冉，广西静江（今桂林）人，禅宗支派云门宗雪窦重显法派法云、法秀弟子，北宋云门宗高僧。徽宗时任东京法云禅寺住持，封传法佛国禅师，熟知佛门掌故。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集有《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为续《天圣广灯录》之作，另有《文殊指南图赞》（亦称《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一卷，均入大藏。

惟白于徽宗“崇宁二年癸未春，得上旨游天台，中秋后三日，至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大藏经，仲冬一日丁丑，援笔撮其要义，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毕之，计二十余万字”。为《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名为八卷，但其二、四、五、六、七卷均分为上、下，实际此录当为十三卷。全目共录佛典1050部，480函，“则函函标其部号，五千余卷，则卷卷分其品目，便启函开卷即见其缘起耳”。（见卷八）以期达到：一、“宗师提倡者，得随宜开觉”；二、“法师讲演者，资阐明训徒”；三、“乐于注撰者，助检阅引文”；四、“有缘看藏者，易晓品义”；五、“无因披教者，知藏乘要义”的目的^①。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对所录佛典，一律采用分类编排，编排次序与《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同，对所录佛典的著录顺序为：顺序号、经名、卷数，每十卷为一函，每函用一千字文标识。下有解题，首叙译、著者，再为内容介绍，指出每部佛典各卷、篇的内容要点，钩玄提要；在大部佛典的末尾，有总括语句，说明该经的重要；对于不同译本及大部佛典的节译本，则注明与何经同，十分便利。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 （宋）王古撰 （元）管主八增订

王古，字敏仲，号清源居士，进士出身，开封人，徽宗时官至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后为成都知府，续而贬为衡州别驾。居东京时，多与高僧交往，曾撰《往生净土传》三卷。元人释克己称其“读经该贯，演义深玄”^②。管主八，元代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生平不详。成宗大德年间，增补《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并将释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录》刻入大藏。

王古深信“暂能一经目，即植菩提根”，而众人却“常时对宝所，终身空手过。”（自序）有感于此，“故兹集要，略尽教条，

溥为来机，豁开宝藏”^③，编成《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八卷，以使“清信乐法人，未暇遍披阅，崑山取片玉，沧溟取如意，随其所欲见，发函即有得，多闻博览人，已知龙藏者，温故捡忘误”。（王古自序）所录佛典，以宋藏次第为序，并撰有解题。元成宗大德年间，由于“流传既久，贝笈未收眼目所存”，“即有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续集秘密经文，刊圆藏典，谓此《标目》，该括详明，谨录藏中，随街披阅。俾已通教理者，睹智灯而合照心之解；未阅圣言者，掬法流而燥惑业之垢。一览之余，全藏义海瞭然于心目之间矣”^④。

经管主八整理过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亦称《大元续集法宝标目》，分为十卷。在体系上仿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录》例，分为四部分：一、总标年代，二、别约岁时，三、略明乘藏，四、广列名题。前三部分全抄《至元法宝勘同录》，第四部分共收录佛典1398部，分类编排。每类前标明本类所收佛典的部、卷、帙数，然后再依次著录顺序号、经名、卷数、帙数、译者、千字文函号，最后为解题。解题有详有略，介绍该经内容，间有评论，指出读此经可得何种功德，有的还抄录该经序文来帮助说明该经内容。对于存在不同译本的佛典，则注明几译，如二者内容相同，则只作一处解题。

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后世称其“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尽美”^⑤。亦有人称其远较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疏略（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

《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卷 目录四卷 《大明释教汇目标目》四卷 （明）寂晓撰

寂晓，字蕴空，秀水人，生平不详，明万历四十一年，“蕴空禅师独罄三十年精力，检阅研究，至眼晕腕劳，不为少辍，遂以南、北二藏教典，节次其题目，表章其品文，一做天台判教科仪，都为四十五卷，题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条析章分，该

详简赅，直使开卷披诵之下，皆可去繁以得要，望径而知归，盲人复其见性，钝质现其灵根”（《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卷一“周序”）。

《大明释教汇目义门》的最大特点是彻底改变了以往佛典按经、律、论分类的传统，而按天台宗五时判教的顺序，即按天台宗所理解的佛陀在世时说法顺序，并将第五法华涅槃时析为两类，又增加了陀罗尼和圣贤著述两类，一共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类，“一遵天台五时而纶贯群经，则雅契佛心”。（《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卷一释广莫和南序）其佛典来源为南、北二藏，共收录佛典1801部，7349卷。著录经名、卷数、著译者，下为解题，介绍该经内容大义及论疏旨趣，并对一些特殊名词加以解释。大部经典分别介绍，异译佛典注明某经与某经同，并指明增加了些什么内容。同时，还大量摘录各经序来说明该经内容，整个解题偏重义理。诸经的注疏，也附于该经之后。

万历四十六年，寂晓又在此基础上，编有节本《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排列与《义门》相同，只是加注各经分属南、北藏某字函，删掉解题，换上注释，非常便于检索。真正做到“检括群经，备诸尺牍，寂寥数语，该彼全文，譬犹振衣必提其领，举目第挈其纲，俾才一披诵，便同指掌之明，即三复咀求，更似食飴之隽，斯诚选胜之轮辕，寻源之舟筏”（《大明释教汇门标目》邹序）。

《阅藏知津》四十四卷 目录四卷（清）智旭撰

智旭（1599—1655），俗姓钟，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号藕益老人。明万历二十七年生，江苏吴县人，二十四岁出家，因见当时佛门流弊，决意弘律，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三十岁时，有感于“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刹

所供大藏，不过絨置高阁而已，纵有阅者，亦罕能达其指归，辨其权实”。因而，“发心阅藏，次年晤壁如镐兄于博山，谆谆以义类诠次为嘱，于是每展藏时，随阅随录”，辗转九地，历时二十年，“始获成稿，终不敢剖破虚空。但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⑥，故而命名《阅藏知津》。

《阅藏知津》的资料来源为明南、北二藏，北藏收录佛典1656部，南藏收录1610部，两藏互有异同，故《阅藏知津》所收佛典当有1700部左右，对这些佛典，智旭采用了分类编排的组织方式。

《阅藏知津》的第一个特点是恢复了《开元释教录》的分类传统，并作了重大改进，创立了一个四大类、五级类目的佛典分类体系。智旭于经、律、论三藏之外，仿北齐《法上录》之例，另立杂藏一类。以往的佛典目录，虽无杂藏之名，却有杂藏之实，如《开元释教录》中“圣贤传记录”即属于此，所不同的是，《阅藏知津》大大扩充了杂藏的收录范围，在“此方撰述”之下，设置了十五个小类，在第十五个小类之下，又细分为十类，将三藏以外的所有佛典包罗殆尽。此外，智旭按《义门》中所崇天台宗五时判教顺序，调整了《开元释教录》以来大乘经的排列顺序，以华严部为首，删宝积、大集二部，增方等、法华二部，并于方等部之下，又仿元代《至元法宝勘同录》，立显、密二部，使显、密二部，界限分明，不致混淆。在大乘论之下，于释经论，宗经论之外，又立诸论释一类，将无法归入前二类的论著收录于此。三类之下，再细分西土、此土。全书各部、类之首，均有小序，以“述曰”起首。

《阅藏知津》对所录佛典依次著录经名、卷数（或纸数）、译者（如为失译，则注明最早见于何种目录）及在南、北藏中的函号。下为解题，多为内容介绍，间有考证、译文评价及经典意

义的评述。对于不同译本的佛典，则仿《大唐内典录》例，将最好的译本置于前面，并分别注明各自翻译特点、文字异同、先后出等，使读者知其应并阅或不可阅。解题文字，详略不一，视该经流通程度而定，流传广者略，流传少者详，其中又以宝积、大集、诸密部、阿含等“卷帙多而人罕阅者”最详，“庶令人染一指而知全鼎之味”（《凡例》）。此外，智旭还于每部佛典之上，标注△、△、△、△、△、△、○、⊙、◎、◎、△、▽、▽、▽等十四种符号，表示该经的重要程度，以使阅者知先后所宜，按照不同要求，去选择不同读本，这也是《阅藏知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除此之外，据《义门·释例》介绍，这类目录尚有明代中期空谷禅师所撰《大藏要略》，惜已亡佚，无从得知其内容及编排情况，故略而不叙，留待后贤。另外，还有两部笔记体带有读藏目录性质的书，一为明宁德优婆塞陈实所撰《大藏一览集》十卷（《昭和法宝总目录》标为宋代，误），其书共收录人们阅读大藏及研究佛教所必须了解的1181个问题，分门别类，列出出自何经、论，并注明千字文函号、卷数，然后加以解释。另一为清康熙间维扬福国沙门元度所撰《阅藏随笔》二卷，共解佛典118部、359章，并注明此佛典为南藏某字函中十卷之某，以偈语形式解，经、律、论俱解，以经为主。由于这两部目录并非为通读全藏而编写的，故略而不论。

三

与雕版大藏经同时产生的读藏目录，和过去的佛典目录相比较，存在着一些明显区别。首先，读藏目录的收录范围是一定的，宋代的两部是以一部大藏经为对象，明清两代的是同时以两部大藏经为对象，而其他佛典目录的收录范围则以全部译经为对象。其次，由于收录范围固定，导致目录结构简化。隋唐时代的

佛典目录，由于材料来源广泛，以及佛典在翻译、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特征都需在目录中反映出来，因而，这个时代佛典目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重登录。一部佛典，在目录中一般需要登录二、三次。以《开元释教录》为例，总录部分为译经年表，需要登录，别录部分入藏录要登，有译有本录要登，这就是三次。如果是异译（同一底本的不同译本）、别生、别行（从大部佛典中摘译出一部分单独行世）、失译（不知译者）、疑伪（确定或不确定的伪造佛典）等，还得在不同类里反映出来。读藏目录，由于其收录的是经过前人整理过后而雕刻的大藏经，上述问题已经清楚，不必再作单独处理，只要按照雕版顺序著录即可。因而，在目录结构上，读藏目录与普通目录相同，均为多重登录。正由于这个因素，读藏目录的分类与著录都比隋唐时代的佛典目录简明得多。再次，由于读藏目录的编制目的与其他佛典目录不同，因而，在对所录佛典的揭示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六朝时期的佛典目录以记录翻译佛典为主要目的，隋唐时期的佛典目录以整理佛典为主要目的。因此，这些目录对于所录佛典的揭示，大多只限于外在形式特征，即对于佛典的名称、卷数、译者、译时、译地、几译，是否失译、疑伪、别生、阙遗等，记录特详。因为如果不注意这些外在特征的揭示，那么，很多佛典是很难彼此区分开来的。读藏目录，由于收录范围一定，编制目的是为佛教徒们阅读大藏服务的，因而，对佛典的外在特征，只要著录清楚就行，无须太细。反之，对佛典的内容特征则必须详加揭示，增加揭示深度，由此而产生的读藏目录另一个特征是撰有解题。

读藏目录，在中国古代佛典目录中，是一个独立的目录类型，它除了具有上述特征之外，还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 编制目的明确

读藏目录是直接为指导人们阅读、使用大藏服务的，这点，

在所有的读藏目录中都交待得很明确。“启函开卷即见其缘起……其利有五：一、宗师提倡者，得随宜开觉……；二、法师讲演者，资阐明训徒……；三、乐于注撰者，助检阅引文……；四、有缘看藏者，易晓品义……；五、无因披教者，知藏乘要义”。“俾已通教理者，睹智镫而合照心之解，未阅圣言者，掬法流而燥惑业之垢，一览之余，全藏义海瞭然于心目之间矣”。“清信乐法人，未暇遍披阅，昆山取片玉，沧溟取如意，随其所欲见，发函即有得，多闻博览人，已知龙藏者，温故捡忘误”。“直使开卷披诵之下，皆可去繁以得要，望径而知归”。“俾才一披诵，便同指掌之明，即三复咀求，更似食飴之隽，斯诚选胜之轮辕，寻源之舟筏也”。“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不管各自说法如何，对其编制目的，都是说得很清楚的，无论对于已读完全藏者还是无缘披阅者，均可作到发函有得，温故捡忘，从中得到益处。

2. 著录简明、实用

读藏目录的基本著录，除了经名与卷数之外，宋代的两部目录，由于只是根据一部大藏经编成，因而，在经名之前均标上顺序号，卷数后注明千字文函号，每字一函十卷，方便读者按字索经，一索即得；明清三部目录是根据明代南、北二藏编成，南、北二藏在收录佛典的经目、排列顺序上均不一样。这样，就没有标顺序号的必要，而只在卷数后分别注明该经在南、北藏中的函号，十分清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阅藏知津》，在每部佛典上加注各种标记符号，以示区别各类佛典，极便读者使用。

3. 解题全面，推荐性强

读藏目录，作为推荐目录的一种，解题是必不可少的。纵观几部读藏目录的解题，基本包括：译者介绍、内容介绍、特点评价。大部佛典，则对其各篇、卷细加介绍，对于有多种译本的佛

典，则注明与何经同。对其译文特点、文字异同也间有介绍，有些还抄录经序来帮助说明佛典内容。对于某些重要佛典，还特意注明诵此经可获何种功德。从佛典流传的现实出发，解题写得详略不一。对于人们常读的，流传广的则略写，人们不常阅读而又重要，或部头较大的佛典则详加介绍，写作手法比较灵活。由于这些解题都是作者多年阅藏的心得，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对于指导读者阅读，指示阅藏门径，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4. 分类日趋合理

佛典目录作为专科目录的一种，大多采用分类编排方式，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目录，分类日趋完整。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中“有译有本录”的分类，代表了中国古代佛典分类的最高成就，“入藏录”的分类与此相同。宋、元、明三代所刻大藏，也都采用了这个分类系统。宋代的两部读藏目录，完全采用了这个体系，未加变更，即使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元人亦只增加了些内容，未对其分类体系加以变更。明代寂晓一反千余年来佛典按宗乘性质和内容特点来区分的原则，采用天台宗五时判教的顺序，创立一个八大类，四十三小类的二级分类体系。然而，这个分类体系虽然接近于佛教的原始意义，但由于与人们千余年来习用分类方法完全不同，无法为人们接受。四十年后，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又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同时吸收了寂晓分类体系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了一个四大类，五十一小类的五级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体系，比以往任何一个分类体系都要合理、科学，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日本“缩刷藏”即全抄此分类，“频伽藏”亦取法于此。

读藏目录，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专科目录——佛典目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部数虽然不多，却代表着宋代以后佛典目录的编制水平，其影响、意义和重要性远不仅仅局限于佛典目录之中。

虽然其读者对象是一定的, 收录范围是有限的, 但其明确的编制目的和编辑意图, 简明、实用的著录, 完备的解题, 合理的分类, 尤其是解题中鲜明的推荐性和推荐符号的使用以及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的分类体系, 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目录学遗产, 对我们今天的目录工作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很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总结、去继承、去发扬光大。限于作者水平及识断, 本文仅就读藏目录的一般特征作一简单介绍与分析, 真正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注:

- ①《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8“五利五报述”
- ②③④《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释克己序
- ⑤《阅藏知津》自序

作者工作单位: 南开大学图书情报学系

〔上接241页〕

注:

- ①③施璲《随村先生遗集》卷一。
- ②韩葵《有怀堂文稿》卷六《织造曹使君寿序》。
- 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四《合刻集韵类编序》。

作者工作单位: 江苏淮阴教育学院